



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变成死城,日军肆意施暴,大屠杀同时开始,正当侵略者洋洋得意之时,复仇的子弹已经向他们射出……

多项史实证明,南京沦陷后,中国军民并没有放弃抵抗,他们用或聪明,或悲壮的方式,让侵略者立即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鬼子攻城炮兵联队长命丧迫击炮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员胡卓然说,他在日本收集到《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史》(以下简称《队史》)一书,记录该联队在侵华战争中所有作战经过与细节。“上面明确记载,南京城墙中的水西门、雨花门都是由14联队轰塌,步兵才得以进城。”

看着一队队日军士兵,由火炮炸开的缺口进入,进而占领南京市区。14联队长井手龙男大佐认为,他已经征服了这座城市。

日军1939年发行的《支那事变忠勇列传—陆军之部》(下称《列传》)记录,

“十四日午后四时,(井手龙男)……视察部队的集结情况,在学校校门北方大约十米处……遭到了发射位置不明确的敌方迫击炮弹攻击……右胸口上方也遭到盲贯弹片伤。”

躲在雨花台的守军士兵一发命中
这枚复仇的迫击炮是从哪里发射?又是何人发射?“现有搜集的资料中,并没有明确史料,但可以根据当时战况以及其他材料推测。”胡卓然说。

作家阿垅(原名陈守梅,南京保卫战时在第88师担任连长),于1939年写出报告文学体长篇小说《南京》(现名《南京血祭》),记录中国守军88师一个迫击炮连在金陵兵工厂的战斗。“连长黄德美,有四门八二迫击炮……(战斗中)损坏了一门,人也陆续死伤……直到被敌人包围起来,掷弹筒和阻击手开始攻击他们,他们还在战斗……”

这些材料是作者采访南京前线撤下的士兵后写成的,可信度比较高。“可以猜想两种情况:迫击炮连幸存的官兵撤出阵地后,携带迫击炮隐蔽在金陵兵工厂附近,伺机发起了一次抗争;或是迫击炮连撤出时,把未损坏的一门迫击炮藏在附近某处,在这一带的88师或87师的幸存官兵,在14日用了这门迫击炮进行反击。”

“只打了一发,这一发就命中目标,

很可能隐藏的中国士兵就在附近,几百米左右。”胡卓然说,“一门迫击炮需3人操作,才能有如此高的精度。”

这个联队长成日军阵亡唯一将领
15日早晨8点,日军宣布了他的死讯,“这对14联队是一次重击。”《队史》记录,除了井手,这一发迫击炮,还击毙了他身边三名士兵,“另有九名不同程度受轻重伤者”。

《队史》记录,“在战死之日,他(井手)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这个记录也显示:井手龙男是目前有证据可以明确证实的,中国军民在南京城的不屈反抗之中击毙的唯一一个日军将领。”胡卓然说。

发出反击的中国士兵下落如何?胡卓然认为,他们很可能成功转移了。“首先是日军的报道、史料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发射迫击炮弹是何人所为的情况。”

根据史料,中国守军88师这个迫击炮连的长官黄德美也幸存下来,因为作家阿垅还给他写过公开信,1941年7月15日发表于重庆的《国民公报》副刊。“黄德美离开南京后,在苏南继续抗日。”胡卓然说,不能肯定击毙井手的一定是黄德美,但目前他的可能性最大。可惜,黄老现在去世。

小舟突袭日舰弹穿眉心毙日寇
据日方资料记载,当时在进攻南京城之际,日军麾下的一艘名为“海风”号

的驱逐舰驶至长江天河口,以辅助陆军主力攻破南京城。

当时“海风”号驶入南京港口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海军的任何还击,如入无人之境。南京城被日军攻占后,“海风”号便在南京下关一带其设立的警戒线附近停泊。

南京沦陷后的第4天,当天凌晨3时25分开始,“海风”号右舷往浦口方向有一艘小木船在悄悄逼近,木船上仅有3名中国士兵,他们用手中的步枪瞄准敌舰上站岗的一名日本水兵,果断射出一枪,射出的子弹从其眉心打入贯穿整个头部,当场击毙。日军随即对其回击,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交战,木船上的3名中国士兵全部牺牲。

据日方记录,被击毙的日军士兵名叫杉本宗五郎,是当时南京保卫战中被子击毙的唯一一名水兵。日军怎么也没想到,跑散的中国部队中居然还有人在做出最后的殊死抵抗。

事实上,这艘小木船在开至长江靠近“海风”号的时候,若他们直接逃往江北,是有生还希望的。但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把船开到敌舰旁边,直接暴露于敌军视线中,已完全不顾自己生死,与敌人做出最后的抗争。

《扬子晚报》2013.12.14文 / 彭 ■ 张可

东南亚的“南京大屠杀”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6周年纪念日。鲜为人知的是,二战时期日军在东南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也犯下了大屠杀罪行。

在新加坡屠杀数万华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230万新马华人全力支持祖国抗战。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等人策划了针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2月18日,日军强令华侨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是生是杀,完全随日军意志支配。最大的屠杀是在海滨和大海上,在加东海滨,数以万计的华人遭到机关枪的射杀;不拉干马蒂海边,昼夜都有船将华人载到海上,将两人背靠背绑紧推入大海。
在“肃清”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华人被残杀?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苏丹医生班德拉博

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则断言:“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巴丹行军美军战俘遭难
1942年3月,菲律宾10多万美、菲联军弹尽粮绝。4月9日,巴丹半岛战区12000多美军和65000多菲律宾军成了俘虏,这是美军历史上缴械投降最庞大的一支队伍。日军下令将被俘人员转移,目的地是奥德内尔集中营,全程110余公里。这就是所谓的“巴丹行军”。

投降的美菲联军早在之前的战斗中,就因为补给不足,造成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恶劣的行军环境成为第一个杀手。最致命的,还是日军凶神恶煞的押送。日本兵随意地处置美军战俘,对于走得慢掉队的,偶然走出队列的,直接刺死或斩首。敢于停下来大小便的人一律处死,不久,所有战俘都学会一边走路一边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整个队伍臭气熏天。日本兵基本不会给战俘吃饭,禁止战俘自己获得食物,且不允许战俘们带水行军。伤病员处境最为悲惨,被视为“累赘”而直接杀死。饱受折磨的战俘们

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走完这110余公里,已经有约1.5万人死于非命。而后,集中营的生活同样悲惨,日军看守随意殴打和虐杀,以及随之而来的疫病蔓延,在之后两个月中,又夺去了大约2.6万人的生命。

最后疯狂:马尼拉大屠杀
1945年2月,美军直逼菲律宾马尼拉城下。在美军强攻马尼拉期间,发生了日军持续一月的屠杀事件。期间,死亡的菲律宾人达10万以上。有一部分是死于美日两军的交火,但大部分菲律宾人是死于日军有组织的大屠杀。美军缴获了这样一份日军命令:“杀死菲律宾人时,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采用节省弹药和人力的方式进行,尸体的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

最残忍、最骇人听闻的是日军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994名菲律宾儿童。日军先在大学餐厅里摆放了一些点心,把孩子们哄骗进来。正当孩子们吃点心时,一个兽兵拉动了藏在灯架内的集束手榴弹,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机枪的火舌下。

《快乐老人报》2013.12.12

我国第一颗核弹的数据是算盘算出来的

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30项被列为非遗的项目。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介绍说,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随中国人经历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

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原子弹有算盘功劳
“珠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徐岳撰的《数术记遗》,其中有云:“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北周甄鸾为此作注,大意是: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是停游珠用的,中间一部分是作定位用的。每位各有五颗珠,上面一颗珠与下面四颗珠用颜色来区别。上面一珠当五,下面四颗,每珠当一。可见当时“珠算”与现今通行的珠算有所不同。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

颗原子弹也有算盘的功劳,科学家们正是利用算盘协助计算机,才完成了原子弹爆炸时中心压力的正确数据。

推广珠算可提高老幼智力
据介绍,目前有珠算推广的对象主要为四类群体:幼儿,智力缺陷儿童,老年人以及大中专院校学生。

2001年,珠算一度退出了小学教材。但后来发现,学习珠算的孩子和不学习珠算的孩子在心算能力及其他智能开发上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学习珠算的孩子心算能力要比不学的孩子好很多。珠心算教育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儿童智力发展的作用。

珠心算,即珠算式心算。以珠算为基础,通过实际拨珠训练,到模拟拨珠训练,最终在脑中形成用珠算运动进行计算的一种计算技能。

上海珠算协会已经在一家康健学校进行了16年的珠算实验教育。珠算可以开发智力缺陷儿童的左脑,提高逻辑思维。由于孩子们的病情不一样,效果并不相同,但是总体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

中国古代也有“霾灾”

北京地处我国北方,气候干燥,尤其是冬季漫长,很容易出现雾霾天气,史称“霾灾”、“雨霾”、“风霾”、“土雨”等,史料中多有记载。

对雾霾天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元朝。据《元史》记载:元天历二年(1329年)3月,由于前年冬天没有降雪,春天又少雨水,天气异常干燥,导致“雨土,霾”,“天昏而难见日,路人皆掩面而行”。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城)门隐于风霾间”。

到了明代,有关“霾灾”的记载逐渐增多。

明成化四年(1468年)初春,《明宪宗实录》记载:“今年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阴翳……近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明成化十七年四月,“连日狂风大作,尘霾蔽空”。类似记录明代北京地区“霾灾”的多达数十次。

清代也发生过多次“霾灾”。康熙六十年(1721年),“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风,榜必损坏”。嘉庆十五年(1810年),“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咸丰六年(1856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总之,每隔几年“霾灾”便会光临京城,多集中在冬季和春季。

古人对雾霾灾害的认识很肤浅,人们多认为是老天爷降的“霾灾”,所以多求神灵保佑,“以期感动上苍,赐下甘霖”。

“霾灾”较大的危害是影响交通运输,古代也是如此。明清时期盛行漕运,也就是使用运河把粮食送进京城,“霾灾”一发生,水路难通,京城的粮食存储量急剧减少,时有危急。

据传光绪年间京城曾出现一次严重的“霾灾”,数日不散,慈禧太后也曾令人在紫禁城内“祭天驱霾”。《北京晚报》2013.11.18文 / 户力平